

聚焦

科题

从一次奇特的购票经历说起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阳

2016年年初,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罗民在科学网上发表博文,吐槽了他包括购买出差飞机票在内的一系列“奇葩”经历。科研报账的纠结,从中可见一斑。

“当科研遇上报账,那感觉就像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罗民感慨不已。

回放 左右碰壁的报账路

一次,罗民的课题组派学生去参加一个在厦门召开的国际会议。从银川到厦门,如果坐火车,一来一回就要用去将近一周的时间。考虑到这一点,再加上火车票并不比打折机票便宜,罗民吩咐学生购买了飞机票。

本来,罗民觉得这个处理方法不错,既节省时间,又节约经费。然而学生参会回来报销差旅费时却发现,这张飞机票没法通过项目经费报销,因为“研究生没有资格坐飞机”。无奈,罗民只好转而申请研究生资助金,又被以同样的理由驳回。

记者手记

需要更多“好声音”

■陆琦

这两天,不少媒体都在为两会上的部长们点赞。

教育部部长回应“二孩”给教育资源带来的压力,住建部部长“接招”房价暴涨问题……今年出现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的,不再是部长们躲避的身影;相反,好几位部长主动走到媒体面前,回应民生关切。

这条百米红地毯上的变化,折射出两会的开放度、透明度日渐提升。当然,会场内外凝聚着民生、民情的“两会好声音”也日渐“唱得响亮”。

不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的代表一看到有记者走来便用手捂住胸牌连连离开;有的还没等记者提问便微笑着摆摆手说:“我没什么好说的。”

诚然,被镜头和话筒包围,代表们会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可仔细琢磨一下,媒体关注的,其实不仅是代表本身,更是代表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精心准备的议案建议;代表要面对的,也不仅是媒体,更是媒体背后的亿万公众。代表的失语,就意味着人民的沉默。

有政协委员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两会代表和委员的观点是否能够充分通过媒体展现出来。”

的确,媒体的公开报道也可以成为促进代表委员履职的重要手段。

也正因如此,代表们可以毫无保留地在舆论场与媒体的聚光灯下仗义执言,反映当下中国最真实的民生,触发这个时代最鲜活的脉搏。

小领域拼就大版图

■倪思洁

近几日,全国政协会议进入到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的环节,小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

去年,一首《十三五之歌》唱响海内外,脍炙人口的歌词翻译过来之后,有这么一句:“先分散调研,听听大伙儿有啥话要说;再集中讨论,看看大伙儿的事儿‘咋做’……来来来回回,上百轮。”

“上百轮”体现了举国上下对未来中国五年走向的重视。如今,“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进入再次集中讨论环节。对全国政协科技界的委员来说,又到献计献策的时候了。

“对于‘双创’,前面说得非常好,但是接着就提到要‘打造双创示范基地’,做着做着又转向了老的发展思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在会上直言。

“环保方面今年着重强调了预防的思想,但是并没有上升到生态安全。”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强调。

从成果转化到创新创业,从水污染到大气污染,从高端制造到新材料,委员们依次举手发言,提出自己对草案里某些具体内容的理解认识。记录员们则认真录下委员们的每句发言,并在成稿后交给委员们确认。

这些建议看似是对个别细节性问题的“纠结”“死抠”。但是,如果前来参会的每位委员都能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提出理性的批评建议;如果“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也能认真倾听和对待这些建议,久而久之,小领域里的小意见必将凝聚成集体智慧,拼就一张更完美的五年规划版图。

经过一番折腾后,罗民只好先帮学生垫上这笔钱,最后找些不相关的发票填补漏洞。

“这不是我们的本意。”罗民说,“我们本来只是做了科研过程中理所应当的事,最后却只能用非常手段拿回自己应得的钱。”

类似的经历还有不少。他的课题组曾因实验需要购买了一个氯气减压阀。因为氯气腐蚀性很强,减压阀做了特别的防腐蚀处理,要价1800元,比普通减压阀贵上3到4倍。在资产验收时,他们被告知该设备价格超标,无法报销。

说是“超标”,但是具体的标准是多少,到现在也没有人跟罗民讲清楚。“可能就是懒政吧。”他说。

追访 “逼上梁山”的科研人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要维持正常的科研活动就不得不做一些不正常的事情。”这是罗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反复表达的一个意思。

在他看来,有些问题是从思路上就错了。现行的科研报销制度建立在一种假设上:科研人员缺乏诚信,一旦盯得不紧,就可能犯错误。而一个没有诚信的体系,其管理所要动用的人力、物力是没有止境的。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罗民相信,大部分

科研人员的人品是过关的。如果一个制度为了约束少数不讲诚信的人,去折腾大部分诚实的科学家,“这样的制度无疑是得不偿失的”。

以设备采购为例,罗民说:“如果你相信我,允许我直接去和厂家沟通。我会选择价格合理的商家,并且尽量压低价格。因为我希望用有限的科研经费尽量多做一点事情。”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国家在严管的同时,能建立更为高效的财务体系,为科研人员服务,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在国内的实验室,都是老师和学生直接与厂家沟通,很耽误工作。”罗民说,“我们其实很希望直接委托专业采购系统去办理。”

罗民认为,报账难的负面影响还不仅限于耽误科研、浪费经费。罗民不无遗憾地说:“当研究生看到自己的导师深陷报账等乱象中时,慢慢会对科研产生抵触等负面情绪。我们一些很有天分的学生就这样流失了。”

点评 报账制度应体现不确定性

“管理制度是一定要有的,不能光靠科研人员的自觉。”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邢定钰说。在科研制度不那么严格的过去,甚至出现过复印飞机票重复报销的情况,类似这种科研经费被钻空子的实例让他颇为痛心。



■本报记者 郭爽

“我们长期对集体林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学校的老师带着学生也走过很多地区,对于我国富饶的土地来说,森林储蓄量不应该是目前这个状况。”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霍学喜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谈起集体林经营时忧心忡忡。

据全国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我国森林面积中集体林地27.95亿亩,占到森林面积的60.01%。但全国森林蓄积量中,集体林达到54.25亿立方米,只占到全国的36.71%,集体林亩均蓄积量不足2立方米(1.94立方米),低于亩均6.00立方米的 world 平均水平。集体林单位面积蓄积量低,但潜力巨大,优化集体林经营是实现森

李蓝委员:助生态扶贫“茁壮成长”

■本报记者 王卉

3月2日是政协委员到两会驻地报到的日子。就在当天上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蓝还赶去参加由农工党中国社科院支部组织的一个生态农业调研成果发布会,期望通过交流完善他的两会提案——《建议国家加大“生态扶贫”的政策扶持力度》。

此前,李蓝参加了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生态农业课题组主持人邢东田组织的一些相关课题调查,觉得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决定总结提炼提交到两会。通过调查参与,李蓝也获悉了一些“靠谱的”生态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名录。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可以是生态文明



①田力普委员发言
②钟志华委员发言
③孙涛委员和寿子琪委员(右)交谈
倪思洁摄

履职故事

霍学喜委员:力图改善集体林现状

林蓄积量增加的重要切入点和主要抓手。

霍学喜多年与林业打交道,对集体林权经营制度不完善、林地细碎化严重等问题多次提出建议,力图改善目前的状况。

“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森林经营难以突破低水平均衡,实现森林蓄积量增加45亿立方米的战略面临经营制度性挑战。”霍学喜指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团队的大样本实地调研发现,2010年、2012年不愿意投资林业的林农比例为45.20%和40.06%,2014年该比例上升到62.93%,导致近20亿亩集体林无人经营、林地资源闲置及浪费。

“我们调查发现林农普遍缺乏承担林地流转风险的能力,即不愿意流转、不敢流转。”霍学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2010

年、2012年和2014年度样本林农的林地平均流转率仅为8.00%,即使通过林地流转,少数林农实现了规模经营、商品化运作,“也面临融资难、投入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

霍学喜表示,现代林业经营制度也需要大量专业人才。而在收入较低、工作条件艰苦的背景下,难以形成激励林业专业人才有效供给的市场环境。如果政府不积极介入,林业专业人才缺失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为此,霍学喜建议,重视引导各级林业站技术人员向林业合作组织流动。同时,制定绿色就业政策,对林学专业类大专院校学生实行学费减免,并支持相关毕业生赴林区工作,形成学林业、爱林业,到林业部门工作的良好氛围,推动绿色就业。

思路,把“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作为扶贫的新模式和新方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特色产业。

但是李蓝认为,生态扶贫目前虽然有了良好的造血机能,但由于产品流通渠道不畅通,社会信任度低,规模效应低导致了价格高,生态扶贫这个新生儿还是不能茁壮成长。

李蓝对此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诸如:总结贵州等地的生态扶贫经验,将其提炼成国家政策;以精准扶贫思路为指导,在全国精心布点选点,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干旱地区,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培育一批“生态扶贫”试点区和示范区;为生态扶贫地区的生态产品提供有国家信誉保证的“生态产品认证书”;制定优惠政策,打通生态产品与市场的流通环节。

“你那个企业最近发展怎么样?”一个人问。

“成立了一年多,政府根本没什么政策落实到我们这儿。税务部门来了就问‘你这个企业怎么还活着’,然后就开始查我们。”回答者显得满腹牢骚。

这段对话是不久前全国政协委员田力普无意中听到的,抱怨者是一位科技类小企业的负责人。此后的多次调研经历让田力普认识到,他无意间听到的“牢骚”并非个案。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他和在座的委员分享了这段经历。

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开展得如火如荼。可对于科技类初创企业来说,生存之路并不平坦。

尽管国家对“双创”给出了不少政策,但在全国政协委员寿子琪看来,有些政策的提法和思路还是“老一套”。“‘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构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全力打造三大‘双创’示范基地。但是,真正的创新企业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政府给予最合适的发展环境,通过市场规律优胜劣汰选出来的。”寿子琪说。

不仅如此,“双创”政策虽然多,初创企业的发展环境仍不是“最合适的”,其中,税费是个大问题。

“很多‘双创’人员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要他们承担那么多税费,初创企业还怎么发展?尽管有政策指明可以在几年内免除税费,但是有些地方的执行并不到位,而且顶层细节的文件也没有出台。”全国政协委员李维斗建议,要给初创企业留出更多成本调整的空间,让企业有机会“活下来”。

这段话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尹卓的共鸣。“说是要创新,但是,越创新成本越高。”尹卓表示,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说,技术创新含量越高,增值税就越高。相反,如果扩大产量,技术含量不高的话,增值税反而低。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培育壮大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持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提出要简除烦苛,禁察非法,使人民群众有更平等的机会和更大的创造空间。

“这说明中央的规划文件说得也好,也非常切中要害,但问题是能不能真正落下来。”田力普说。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田力普在引用完这段话后说:“创新就意味着失败的可能,可能所有投入都会打水漂,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如果政策不能落到每位创新者的身上,那他们还有什么获得感、满意度,还会想继续创新吗?”

我向两会提建议

霍金花代表

建立科研项目人员费用柔性管理机制

本报见习记者潘希“目前,国内高层次科研人员的报酬与国外差距明显,远远不能达到科研人员的心理预期。我国科研人员年均劳务成本仅为韩国的1/6、日本的1/12。”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科协主席霍金花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建立合理的科研项目人员费用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霍金花认为,目前,科研项目人员费用管理机制“一刀切”。国家自然科学类课题较侧重设施和耗材投入,而软科学研究和软件开发类的科研项目较侧重人力资本投入,没有根据项目类型设置不同的人员费用支出比例。同时,科研项目评估方式不能完全反映科研项目的实施过程及效果,科研评估浮于表面。科研项目经费监督管理机制滞后,科研经费监督问责制不健全。

对此,霍金花建议,应完善科研经费管理中人员费用相关政策,设置柔性的人员费用管理机制,并完善科研项目评估及监管机制。

“根据项目类型,合理划分不同项目人员费用比例,并给予项目负责人一定比例项目经费的自由支配权力,以调动其积极性。同时,建立严格的预算制度和执行制度,保障各科目经费合理充分使用。明确科研经费中人员费用使用范围,定期或不定期对科研经费的管理规定及经费收支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防止出现科研经费资产流失等问题,并将不良行为记入个人诚信账户。”霍金花说。

何力委员

建国家实验室优化创新体系

本报见习记者黄幸“科技创新已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走好科技创新这步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研究员何力近日对《中国科学报》表示,建设国家实验室,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对于改革科技布局、推进科技发展、重组科技资源、优化创新体系、提升创新能力将产生深远影响。

何力认为,国家实验室建设将深刻影响国家创新力量布局 and 方向,为确保国家实验室在科技创新中的引领作用,需要改革体制和科技投入方式,保证国家实验室的独立性和开放性,凝聚优势科技力量和长远的持续稳定发展。

他建议,选择具备条件的优势科研机构 and 大学,打破行业壁垒,通过资源整合、重组等方式建设真正独立运行的国家实验室,并建立与实验室科技目标匹配的、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

建设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基地承担国家重大科研及任务和组织开展前沿科技探索,是科研活动必要的组织模式 and 需求。当前应该通过国家实验室建设,横向整合多元化创新主体,打造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打通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潜能。